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JOURNAL OF THE SILK ROAD STUDIES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

第一辑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JOURNAL OF THE SILK ROAD STUDIES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

| 第一辑 |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一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3249-7

Ⅰ.①丝… Ⅱ.①陕…②陕… Ⅲ.①丝绸之路—丛刊 Ⅳ.①K928.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5066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
第一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3249-7

2017年5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16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3
定价:98.00元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编委会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

本期主编： 沙武田　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编　　委：（以姓氏字母排序）
程　旭　陕西历史博物馆
Daniel C. Waugh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 *The Silk Road* 杂志编辑部
肥田路美　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
葛承雍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何志龙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霍　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刘进宝　浙江大学历史系
罗　丰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Matteo Compareti（康马泰）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东方系
ПАВЕЛ ЛУРЬЕ（Pavel Lurje）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东方馆中亚与高加索部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
沙武田　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松井太　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王　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建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杨　瑾　陕西历史博物馆
伊林娜·波波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
于志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张建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张先堂　敦煌研究院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编辑成员： 郭　静　刘人铭　马丽　杨丹　杨冰华　杨效俊　朱生云　翟战胜

本期执行编辑： 杨冰华

发刊词

丝绸之路的历史精彩纷呈，在这条道路上刻写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曲折进程，记载丝路沿线各民族努力与外界沟通交往的艰辛轨迹，展示内陆欧亚各国各民族万花筒般交融互动的历史。针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学等现代学科的研究旨趣所在，其最终的核心宗旨是揭示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演进史。

透过历史文献、考古发掘、田野考察对这些被时间湮没的历史进行探究，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与启迪。其中最引人入胜的研究即包括对漫长丝绸之路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地点保存或新发现的考古遗迹、遗物或图像等“形象”资料的解读所得到的历史认知。我们今天的工作，充其量是以少积多，以小见大，最后如果能达到万涓成溪，百川归海，力图为完整的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就十分满足了。

当今时代，丝绸之路研究展现出全新的时代气象，有关丝绸之路研究新的学术热潮已然来临。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创办《丝绸之路研究集刊》是学术发展的需要，更是一种学术情怀使然。汉唐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理当是今天丝绸之路研究的重镇。因此，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古都西安接续国际学术界百年来未断之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热情，搭建新的学术平台，为推动丝绸之路研究尽绵薄之力，才不枉对丝绸之路起点汉唐长安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历史馈赠。

本刊的任务是借学术同道的力量，深入挖掘丝绸之路历史、地理、民族、宗教、语言、文字、考古、艺术的“新资料”和“旧材料”，提出“新问题”，复原丝绸之路上跌宕起伏、有血有肉的历史，展示丝绸之路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无穷魅力。但丝绸之路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其广泛，我们能力所限，不敢求全，只能有所侧重。因此，就具体的研究方向而言，本刊尤其关注考古、艺术、图像资料所带来的“视觉形象”，倡导“以图证史”的研究方法，以期在漫长丝绸之路上保存或发现的各类色彩丰富、题材多样、可观可感的“艺术”与“图像”实物中探寻丝绸之路真实、复杂、生动、有趣、“见物见人”的“形象历史”。

当然，任何与丝绸之路研究有关的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学术规范、文风朴实的文章都是十分受欢迎的。

任何学术刊物的发展，都需要学术界同仁的支持。同样，除了我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积极为学术同行服务的同时，诚请学术界同仁给予支持！若能为繁荣学术、繁荣丝路、推动丝路研究做些增砖添瓦的工作，也就足够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发刊词 …… 沙武田 ii

中古时代胡人的财富观 …… 葛承雍 1

河西“之蜀”草原通道：丝路别支考 …… 王子今 16

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 …… 杨富学 29

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与最初的走向 …… 刘　瑞 46

跨越洲际的旅程
——敦煌壁画中日神、月神和风神图像上的希腊艺术元素 …… 张元林 56

西域“红蓝”花名考 …… 刘景云　杨建军 69

胡瓶传入和唐人注酒方式的改变 …… 高启安 80

从波斯到中国
——丝绸之路上来通角杯的传播与变迁 …… 韩　香 93

唐代玉带銙上的胡人伎乐形象 …… 杨　瑾 108

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图像
——以敦煌画商人遇盗图为中心 …… 沙武田 122

金山国时期肃州地区的归属
——以法藏敦煌文书P.3633为中心的考察 …… 杨宝玉 156

河西走廊出土文献中的丝绸之路意象 …… 贾小军 164

论古代新疆“说一切有部思想文化带” …… 霍旭初 173

北凉石塔刻经与写经生 …… 崔中慧 191

西域瑞像流传到日本
——日本13世纪画稿中的于阗瑞像 ……［日］肥田路美　著　卢超　译 200

古代中韩舍利瘗埋的比较研究
——以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中心 …… 冉万里 215

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南壁宝冠佛像浅析 …… 张小刚 240

窟主与敦煌石窟的开凿与重修
——以阴氏家族为中心 …… 张景峰 253

《历代名画记》中的“鬼”“神”考 …… 杨　丹 268

西夏佛经版画再探 ……［美］黄士珊　著　杨冰华　译 279

和田达玛沟出土棕地黄色莲花舞蹈狩猎图案锦时代考 …… 张世奇 310

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况及墓葬编号
——以可移动文物普查与国保档案为中心 …… 李亚栋 318

Lions from Sogdiana to Chang'an (550—755) …… 毛　铭 328

英文摘要 …… 346

英文目录 …… 356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征稿启事 …… 358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稿件格式规范 …… 359

中古时代胡人的财富观

葛承雍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中古时代，粟特胡人文化属于突厥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文化的混合体，突厥的游牧生活使得其“财富观”有种突然渴望暴富的欲望，粟特与波斯的邻居关系又使得他们的经商观念冲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由于整个中西古道上的商旅之路与边界集市常常容纳着不同文化、不同族属、不同需求的人们，胡商的贸易界点、冒险经营、中介掮客等行为都追着利润跑，不仅使得中亚粟特与黑海、咸海、锡尔河、伊犁河、额敏河的日常生活连成一体，而且“跨文化贸易”吸引更多的胡商闻风而至，他们甚至被打扮成逐利起家的“商业之神”。

一 快速发财的暴富欲望

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并没有严格的民族区分和地域划分，康国、安国、史国、米国、石国、穆国、曹国等，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封建式国家。在西突厥汗国管控下，更没有建立大帝国的可能。这一特点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彼此相互融合，并不强烈排斥，互为通婚，互为依靠。二是相互争夺地域与人口，没有明确的边界疆域。先有绿洲城邦式国家，后有部落式主体民族。所以中亚昭武九姓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处在连续不断的相互征伐和劫掠的历史（图1）。[1]

经历过上千年的劫掠和征伐，绿洲邦国之间存在着长久的争夺战，常常会把历史的偶然性看作是必然性，将随时出现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导致的财富转移看作是正常的规律，汗国之间吞并与抄掠影响到他们的财富观，认为人与人之间变幻无常，部族与部族之间翻脸无情，把劫掠和征伐造成的“一夜暴富”或者“瞬间赤贫”看作是生活常态，从而使为金钱所奴役的贪婪人性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似乎也是中亚内陆的宿命。所以汉文典籍里记载胡人商家往往都是用“性贪”“奸诈”等贬斥的语气。

玄奘《大唐西域记》绪论中就说粟特胡人“建城郭，务殖田畜，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同书卷一又说：“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玄奘两次强调粟特民族“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大抵贪求，父子计利”，可见对他们有着颇不以为然的蔑视。

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中亚草原一带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传统农业劳作渐渐无法进行，粗放式的畜牧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受绿洲城堡文明的影响，有很多粟特人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文明后，

1 葛承雍：《丝绸之路与古今中亚》，《历史》1998年第3期（台湾）。

图1-1　吉尔吉斯碎叶城遗址探方与宣礼塔

图1-2　波斯萨珊王朝执权杖国王（选自《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珍宝僧侣和商人》）

经营果园、提高园艺，从事商贸和其他生计。居住在山区的粟特人则是放羊畜牧的另一番生活状态，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泽拉夫珊流域大大小小绿洲上的粟特人迥然不同（图2）。

当时中原汉人并不清楚粟特人的地理形貌和生活状况，在汉人眼里粟特人就是一个商业种族，《新唐书·西域传下》记载康国“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1]。从3世纪到9世纪，大批粟特商人西走东入，左右逢源，动辄数百人至上千人，组成的胡商驼队闻名于世（图3）。经商的胡人在各地经营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但是要长久维持除了建立起移民聚落，还必须依靠本地的统治者或官府，特别是与北方游牧民族兴贩，担当起协助突厥、嚈哒、柔然、回纥等种族的中转者、中介人与沟通者（图4）。

突厥的游牧经济是一种生产部类单一的不完全经济，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奢侈品不能自己生产，所以游牧民族对交换的需求远远高于农耕民族，依靠的商人在游牧社会中地位亦高于中原汉地。突厥活跃在草原时，可汗集团中就有着粟特商人的身影，掌管着理财赋税，网罗天下大利，有时甚至成为与隋唐商贩交往的垄断者，而且这些胡商鼓动可汗南侵掠财，不仅可以获得暴富，还沉湎于享受荒淫腐败的生活之中。《通典》卷197《突厥上》记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2]

在突厥强盛时，出于对东西方利益的共同兴

1　（唐）杜佑撰：《新唐书》卷二二〇《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4页。

2　（宋）欧阳修、宋祁撰：《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中华书局，1984年，第1070页。

趣，游牧的突厥族和擅长经商的粟特人经常相互协作，成为6—8 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粟特人因此大量进入并留居于突厥汗国政治中心所在的漠北地区，粟特商人与突厥贵族互为一体的现象不是个案，至少是合伙人。突厥要借助不断的扩张战争来获得暴富，也必须倚仗粟特商人，特别是远程贸易的商团离不开突厥统辖下的保护，双方结合成为惯例。突厥部落中甚至有专门的胡部。始毕可汗（611—619）时期，其宠信的粟特胡人史蜀胡悉“性贪”，率领胡人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1]。为了抢做生意，胡人不惜全部落驱动，撇开突厥人群争抢利益。颉利可汗（620—630）亲信的“胡酋”康苏密携隋末逃亡突厥的萧后及炀帝孙投降归唐，“胡酋”自然领有以胡人为主组成的部落。《安菩墓志》记录“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他们很早就由安国融进突厥部落，直到贞观四年“领衙帐部落”随同突厥降众进入长安[2]。

每当突厥人掠夺到的财富与奴隶消耗殆尽时，又开始新一轮的军事征服再次掠夺，逼迫休养生息的农业民族再度抵抗。为防御突厥抢掠，汉地只好开设边关贸易，但突厥的交换贸易总需要胡人的协助，胡商的特质决定了这种扭曲的商贸兴盛，不惜杀鸡取卵，巧夺豪取，而用汉地传统儒家重农轻商理论反对这种掠净劫光、竭泽而渔的扭曲，显然不符合粟特胡商的财富观，汉人恨商、仇富心理只会引起胡人的更大反感，双方观念的碰撞在所难免。

西安北周安伽墓中胡人商旅图，显示胡商载物

图2　巴基斯坦考古博物馆藏僧院出土4—5世纪胡人供养者和其妻子

图3　美国纽约J. J. LAlly东方艺术馆收藏唐代陶骆驼和胡商俑

1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2页。

2　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37—39页。

图4-1　西安唐李凤墓胡商牵驼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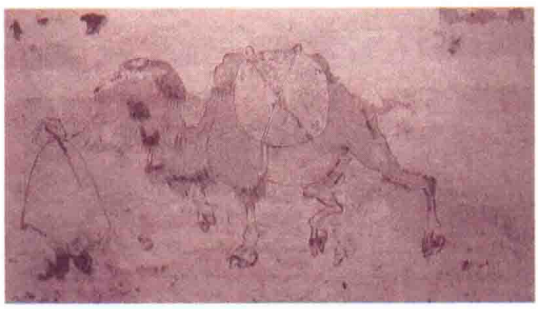

图4-3　平定西关村M 1 墓室东南壁胡商驼运图

图4-2　太原金胜村唐墓胡商牵驼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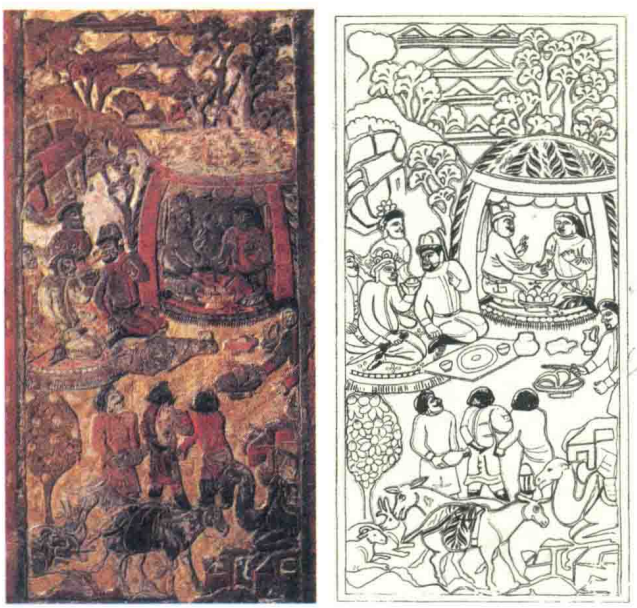

图5　西安北周安伽墓中野宴商旅图及线描图

驮运的场景，可是随后就是与突厥人相见会聚宴饮乐舞图（图5）[1]。史君墓石椁西壁上表现胡人商队行进中的狩猎图，也有披发突厥人擎隼合作形象[2]，紧接着就是欢庆宴饮的场景（图6）。日本秀美博物馆粟特围屏的胡商骆驼图中，亦有披发突厥人骑马护送的图像（图7）[3]。隋代安备墓中石椁画也是胡商首领佩珠戴镯、饮酒作乐[4]，颇有即时奢靡筵宴的胡风（图8），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胡人“竞择生存、及时享乐”的观念。

胡商的暴富心态与经商观念，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只能看到眼前利益，无论是对突厥的

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杨军凯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图版三七正面屏风，文物出版社，2003年。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史君墓》图120石堂背立面图（北），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3　MIHO MUSEUM，South Wing南馆图录，日本美秀美术馆编集发行，1997年，第251—255页。

4　葛承雍：《隋安备墓新出石刻图像的粟特艺术》，《艺术史研究》第1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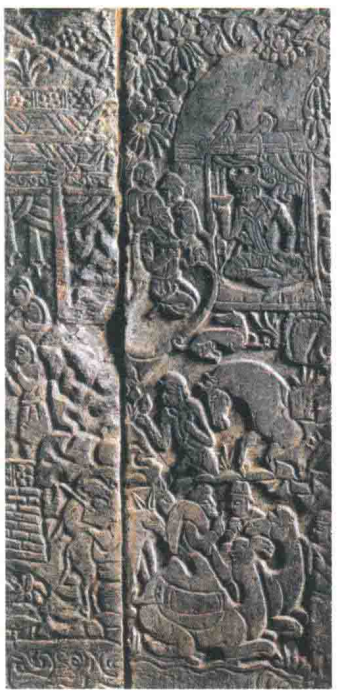

图6　史君墓胡商宴饮图及线描图

图7-1　日本Miho博物馆藏突厥首领和狩猎者石刻

图7-2　日本Miho博物馆藏中亚乐舞场景石刻

依附或是对汉族的朝贡，以及对嘌哒、柔然、阿拉伯的贸易中都求快速发财、短期刺激，他们热衷为自己财富骄傲时，从不显示它的来源，隐藏在昂贵价值的外衣下的，是他们沉溺于这种财富观中不能自拔的状态。

二　财多为贵的炫富心态

隋唐时期的中国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高峰，当隋唐重新统一中原疆域的时候，粟特胡人区域不时发生混乱，碎片化版图的小王国从未真正统一过。然而，横跨欧亚大陆交界的东罗马帝国与西亚波斯帝国形成的消费市场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与中亚区域市场产生互动，直接促使粟特胡人商团的兴起，他们历经艰险，走向四方，长距离的贩运贸易不仅开辟了多条商路，而且促成了一批商业城镇沿着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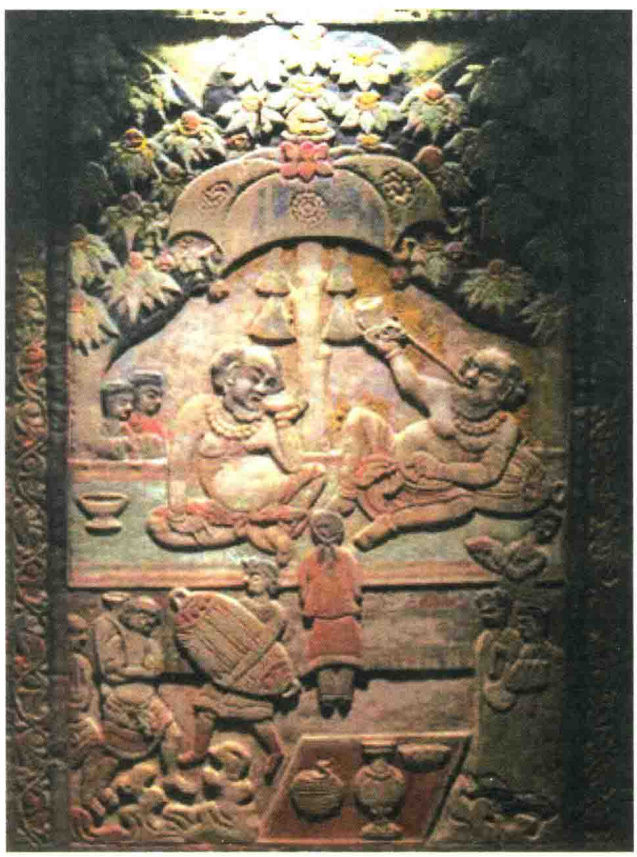

图8　洛阳安备墓宴饮图

道陆续兴起[1]。这也是粟特胡商开启东西方商路的历史性贡献。

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长安、洛阳、酒泉、张掖、武威、原州（固原）等以及延伸的节点城市如云州（大同）、并州（太原）、定州（定县）、营州（朝阳）等，都是商品、资本、贸易、宗教、文化的汇聚点，尤其进入隋唐时代后，长安、洛阳成为吸引粟特人新的财富的磁石。《开元户部格》颁布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云："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2]也就是说，唐朝交易管理体制中，粟特胡商取得过所公文是可以不受限制进入内地的。特别是，奢侈品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源泉。西方要向中国输入奢侈品，贵族富有阶层对进口的奢侈品有着极大的兴趣，拂菻、波斯等高档奢侈品十分受欢迎，长安市场推动着奢侈品的热销，达官贵人最钟爱的物品许多都是外来的，金银器、玻璃器、毛织品、香料药材、貂皮裘毛等。隋唐朝廷都"盛言胡中多诸宝物"，不时派遣或委托胡商寻觅异域奇珍异宝。

胡商对商业利润的追求，特别是奢侈品的运输和高额的利润，不仅引发统治阶级和贵族富豪贪婪欲望的无限放纵，也是推动胡商贪欲和关注社会需求的扩展动力，一夜暴富的神话流传在西域中亚亦是他们渴望财富积聚的动力。

粟特人爱幻想"机遇难得、不劳而获"和一夜暴富，这种财富观形成了他们的独特性格，他们要及时行乐，放纵挥霍，尽情享受，不惜一掷千金，耽于声色之中。敦煌文书P.3813《文明判集》中记述"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虽然他们没有唐人夸耀的族望，可是"侮慢朝章，纵斯奢僭。遂使金玉磊砢，无惭梁、霍之家；绮縠缤纷，有逾田、窦之室。梅梁桂栋，架向浮空；绣桷雕楹，光霞烂目。歌姬舞女，纡罗袂以惊风；骑士游童，转金鞍而照日"[3]。这些留在汉人印象里的粟特胡商是多么骄奢淫逸，而且粟特人的财富观极易导致他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过分"金钱化"，重利轻义，同是粟特人的邻里"借衣不得，告言违法式事"，亲兄弟家贫壁立，也不分给救济。粟特人连死后埋葬还要口含金币，葬俗中渡阴河必须缴纳金钱，生活中金银钱币的追求是他们的一贯爱好。

胡商身上"粟特人"的性格特征是十分复杂的，很多对立统一的特征与因素存在于这群人之身，被称为"多面孔"：豪迈与细腻，粗狂与小心，冲动与隐忍，诚信与狡诈，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好面子"。《太平广记·魏生》说："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描写魏生参加商肆中胡人商贾居多的"亮宝会"时，因为持有"大逾径寸"的明珠，"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4]。从史书上看，排位子、论名次、看穿着、观举止，都与炫富和"面子"直接相关，没有"面子"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有时需要用赌博全身力气

1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37—110页。

2 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五卷S.1344《开元户部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77页。

3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444—445页。

4 （北宋）李昉、扈蒙、徐铉等撰：《太平广记》卷四〇三《魏生》，中华书局，1961年，第3252页。

去维护，这也导致他们与亲朋好友之间往来受到一些限制，有时商人之间的冲突竞争是直截了当地拼“面子”。

《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安禄山在幽州担任范阳、平卢两节度使时，“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1]。这是一边集体举行祭祀祆神活动，一边“列珍宝”大摆“宝主”有财的面子。

胡商“财多为贵”，经营好胜心强烈，热衷于比阔显富，只要争得面子，挽回心理落差，不求回报，就算成功了。胡商总是幻想通过珠宝突然发财，有着斗宝的传统，其“斗宝”不仅有着“点石成金”“神力暴富”的心理，而且面子心理异常强烈。戴孚《广异记》中《宝珠》说“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结果诸胡发现“冠上缀珠”竟是传言丢失的中国宝珠，诸胡恨叹不能已有。[2]唐人描写胡人的笔记小说有近三十条，里面有许多识宝、鉴宝、寻宝、赛宝的故事[3]，都反映了胡人的财富观（图9）。所以胡人在中原汉人眼中既是吝啬贪财的奸商，又是大手大脚的阔佬，其异样心态不仅在笔记小说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且《宣和画谱》卷一说唐代大画家阎立本还专门画过《异国斗宝图》。

胡商的个人面子促使粟特人要赢得种族面子，维护自己的商业网络，所以在利益划分方面不惜动武冲突，以至引入其他大国干预或介入，历史上西突厥汗国长期控制着西域、中亚，有时就与粟特人引入、臣服以求得突厥庇护有关。

图9　7世纪塔吉克片治肯特富商家壁画宴饮图

胡商进入隋唐时期的中国，既顺应了社会稳定和财富急剧积聚的时势，也钻了汉人不屑于经商致富的空子。胡人擅长游商的客商与“坐贾”定居胡商相结合，形成了大规模的商业活动，隋代《安备墓志》中甚至用战国“白圭之术”和“玄高之业”两个经商致富典故，赞颂粟特胡商善抓商机、精明经商从而“闻于邦国”[4]，而且墓志透露出安备利用自己仕宦北齐至隋的经历，与各地胡人有着频繁密切的联系，这也是胡商聚落为“点”、长途贩运为“线”的特点。

中亚河中地区和里海周边，游牧形态下的商业运作，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影响不同，绿洲城邦国家游牧的生产方式与中原定居农耕的生产方式在财富积累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追求金钱与财富主宰了粟特人社会生活的目标，与中国传统社会尊重知识、爱惜家庭、讲究儒雅、和气生财、诚信礼义等价值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在粟特人眼中，汉人迂

1　（唐）姚汝能撰：《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2　《太平广记》卷四〇二《宝珠》，中华书局，1961年，第3238页。

3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

4　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18页。

腐、不识时务、固土守财、节俭省费、不愿远游、袭旧不化等。而胡商善于利用各个政权的权力资源，选择与突厥可汗、匈奴（嚯哒）单于、汉人贵族官员等几方进行合作，在政权更迭变换期间更会趁虚而入。唐初武威安国移民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凉州李轨的割据势力，从而获得了稳定的长期居住权。安史乱后以粟特人石野那为代表的“回纥首领开府”六人使团入京朝见唐代宗[1]，他们既是外交使节又是官商代表，不仅政治上推进了唐朝回纥联盟，经济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互相利用的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

三　铤而走险后的尽情享乐

中古文人在文学作品中站在自己的立场，用穿凿附会的文学演绎，将胡商“标签化”成贪婪喜财、人性狡黠的奸商形象，“幻化”为财大气粗、身家巨万的豪商富贾，但很少描写他们侥幸逃过商道上的艰难险阻，没有人关心胡商兴贩时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在跨国经商过程中，胡商执商道上大宗行业物品，一个来回耗费数年，只有在异域结帮入伙组成商队才能互相扶持照应。风险巨大和利益均沾都是相辅相成的。在跨界、跨国贸易中没有什么胡汉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标准，它就是一桩桩生意而已，赚亏无常，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

胡人贩运于丝绸之路上，野外露宿或入店休息，经常遇到盗贼抢劫和敌对国家官军的劫掠，即使有

图10-1　敦煌莫高窟第45窟胡商遇盗图

图10-2　胡商遇盗图线描图

少量武装护卫，也会遇到危险紧急状况，就像敦煌莫高窟45窟所绘的那幅著名的《胡商遇盗图》，胡商们只能把货物交出摆放在强盗眼前，用货物免去一死（图10）。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尽管史书没有留下具体记载，但是我们知道胡商只能藏物躲避。1959年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自治州乌恰县一个山崖缝隙间，曾发现947枚波斯银币、16根金条[2]，可能就是商人遇到劫掠者时不得已紧急掩埋的遗留物。青海西宁城关城隍庙街也发现藏有萨珊波斯银币76

1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06页。《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也记载：“回纥遣其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见天子”，中华书局，1975年，第7301页。

2　李遇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第482—483页。

枚的窖藏，推测也是商人遇见紧急事件发生时埋藏。[1]其他在中国各地发现的成批金银钱币也在陆续公布，基本都是有意埋藏的，说明商道长途贩运时危机四伏，险情随出。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与商人一起结伴从疏勒（今喀什）到沮渠（叶城）期间，“同伴五百皆共推玄奘为大商主，处为中营，四面防守”。说明商队露营的险象与“环团”措施。玄奘曾在阿耆尼（焉耆）亲眼见到“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2]。佛经中有五百商人遇盗图，虽不一定非是五百人，但表现的就是这种几百人共同结伴的实际。西魏废帝二年（553）吐谷浑与北齐贸易，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拔、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3]。粟特商队首领“萨宝”往往兼任武装护卫职责，加授军事都督等官号，利用管理胡人聚落的方便，传递、串联和控制商道沿线的贸易信息，保障贩运往返的安全。

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经商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胡商常常将珍稀珠宝缝在身上胳膊臂下或是大腿根处，隐蔽携带就是担心遇盗或不测之事。商人有钱赚是做生意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给自己也给买家带来丰厚的利润。胡商并不因为缘分而心怀感恩，本质上讲究交易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特别是若长途遇到灾害失事、关津没收、半道遭劫、瘟疫传染等风险，担保、补偿、赔付等办法往往无法落实，历经艰辛的财富顿时会消失，所以用汉地伦理道德来衡量粟特胡人的商业精神常常不得要领、南辕北辙。

胡商与汉商交往的常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4]，清楚地显示咸亨年间（670—673）居住在长安的“兴胡”粟特商人与汉人结伴来到安西、弓月城及中亚经商，曹禄山之兄曹炎延诉讼汉人李绍谨借贷资金（练绢丝绸）产生的纠纷，这种“同伴”相互融资贸易关系活跃于整个唐代。

汉人对胡人的“警世通言”“醒世通言”就是大量增加的财富会成为精神重负，会有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因为即使定居在城市的富商也会遇到抢劫。所以富裕起来的胡人转而乞灵于宗教，皈依佛教，悟道入禅，我们看到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中胡商供奉菩萨图，胡商的载重毛驴和负重骆驼卧下，佛祖身下两侧五个胡商，有的手捧装有九个钱袋的盘子，祈求佛祖保佑；有的手端装满宝物的托盘供奉佛祖，其余形象各异的胡商则合掌下跪，虔诚拜佛的样子表现出对平安的祈盼（图11）[5]。这无疑是最生动的解读，求佛保佑正是胡商们感到无法预测自己命运时的心灵寄托（图12）。

植根于中亚粟特定居的中心城堡，他们对积累

1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05—110页。

2 （唐）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

3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吐谷浑，中华书局，1971年，第913页。

4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70—479页。

5 岳峰主编：《新疆历史文明集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0窟佛本行集经变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的财富本来就尽量消费，装饰华丽的大厅，炫耀自己的豪华，捐献宗教建筑的公产，其潜在的观念就是尽情过上贵族的生活，把商业财富与贵族文化融为一体。西突厥征服并控制中亚后将北齐、北周贡纳的中国缯絮彩锦等丝绸品交给粟特人，大量丝绸由此转运西方获得不菲财富（图13），更加增添了粟特人意外降临财富的心理，所以他们借助突厥汗国的力量尽力拓展商业利益，有着坐收渔人之利的强烈的快富、暴富的心愿。

北朝时胡商大量涌入中国，“西胡化”的北齐不仅“胡人小儿”充斥宫廷，而且胡人富商入仕朝廷，疯狂索取经济回报，一度引起汉人朝臣的极大反感，胡人“金钱化”的财富观造成各阶层普遍腐败，胡商本身也急剧分化，刚入道的年轻胡商对现实社会充满失望，对未来也没有期望，所以形成爱占便宜的性格，总想用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多的钱财，甚至违背社会公理与正义，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而隋代建立后朝臣中极力推行儒家的社会价值观，胡商曾一度遭到贬斥，以纠正“滥得富贵”的歪风邪气。

四 商业竞争的垄断独占

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两河地带的正中央，比起其他边缘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要高于周边地区，但也是频繁遭受外部侵扰的地区，迫使其不得不打开封闭的眼界。早在4世纪初，粟特人的商队就以敦煌为据点深入中国腹地，并与自己的祖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7—8世纪，粟特人的聚落型的居住网点已经布满了西域（现新疆）。根据已发现的粟特遗物和刻铭文字，以及中国和阿拉伯

图11 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20号洞窟胡商供奉菩萨图

图12 新疆克孜尔石窟萨薄商主燃臂引路救商人壁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